

中国四十年开放型发展道路： 战略节点与理论内涵

张幼文

摘要 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是通过一系列重要的战略节点来实现的，具有深刻的理论创新意义。中国构建开放型发展体制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个战略节点。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通过一系列战略节点来推进和实现的。全球化经济规律证明了中国开放型发展机制的理论内涵，证明了推进自主创新的必然性。当前，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新的课题，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高质量发展对开放的要求，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等，全球化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开放型发展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 改革开放四十年 开放型发展 要素流动 经济全球化

作者张幼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上海 200020）。

中图分类号 F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09-0044-12

四十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经济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奇迹。这一成就靠的是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推动发展。四十年发展成就蕴涵着广泛的经济学原理，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和世界经济学等各个领域。特别是基于国情和经济全球化内在规律的中国的实践创新推动了理论创新。从经济学理论内涵上认识四十年对外开放实践将使中国更坚定地走开放型道路，并成功应对各种新的挑战。

一、构建开放型发展体制的战略节点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一个封闭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出发的，如何突破这一体制障碍，由封闭转为开放，特别是怎样开放才能使发展更为高效，进程更为平稳从而发展更可持续，是整个战略的关键。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是通过一系列战略节点来推进和实现的，这些战略节点的突破有着坚实的学理依据。

（一）以特殊政策突破旧体制束缚，为经济从封闭向开放转型开辟了道路

对外开放既是一个从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的过程，也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过程。如此重大的改革在当时条件下的阻力是可以想象的。开放既要摆脱人们的思想束缚，又要防止外来冲击过大引起动荡。“特殊政策”成了实现这种突破的关键手段。特殊政策避免了“姓社姓资”的争论，它告诉人们，即使担心某些做法不是社会主义，也只是在个别地区、个别领域中实施，整个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些也许是“非社会主义”的做法是为我所用和被控制的。思想僵化的突破口就是这样被打开了。

以特殊政策推进对外开放也在于突破现行体制的障碍。不论是外贸还是外资，在旧体制下发展都有各种制度性障碍。这些障碍就是企业经营的制度性成本，如果不能消除，既会严重影响国内企业的竞争力，

也会影响外商投资的积极性。特殊政策的意义就在于以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补偿企业所承受的制度成本，从而使这些企业能在体制转型全面完成之前成长起来。

特殊政策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的一种重要历史现象。正是特殊政策从个别地区和外向型经济中开始逐步普遍化，通过对外资外贸的普遍激励，中国顺利地完成了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的转型。与对内改革一样，所谓特殊就是对当时的体制规范的背离。然而正是各种特殊政策构建了更好的商务环境，这是中国对外开放得以启动的一条基本经验。

（二）农村改革与劳动力流动成为中国要素优势得到发挥的关键

以开放实现发展的主题首先是工业化。工业化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从低端加入国际价值链分工的模式。以加工贸易为形式的出口发展需要的是大量低端劳动力，农村的改革为此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中国人口众多，在走上高速发展之前这些劳动力只能留在农村，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农业以避免巨大的城市就业压力。在当时的制度下，劳动力是被束缚在土地上的，盲目流入城市是被严格限制的。集体所有、按劳分配保证了农村的社会稳定，也减轻了城市的就业压力。

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内容的农村改革既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也迅速释放了农村劳动力。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允许这些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改革为此创造了条件。农业释放的劳动力被允许在城市务工，差别只是暂时不能获得城市户籍。正是这样，大量先前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劳动力，包括外资、国有、民企或乡镇集体企业的劳动力，其中外资加工贸易企业是吸收农村劳动力的主体。

农村历次改革不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维护了农民与土地的所有权关系，这就使农村劳动力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一支有着特殊意义的劳动大军。这支劳动大军吃苦耐劳，具有很高的性价比，在中国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出口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更凸显了中国的劳动力优势。

（三）以园区式开发模式集聚政策资源，实现产业集群节约运营成本

对外开放以来，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大量经济园区，包括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工业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等。这些园区许多以吸收外资和发展出口为主要目的，特别是在早期是这样，成为国家开放型产业发展的缩影。

园区型经济模式是国际上常见的一种产业发展模式，但中国在此做出了多方面创新。除了土地、道路、水电、通信等各类基础设施得到集约使用外，园区型经济使政策资源得到集中使用，对入区企业的政策优惠促进了企业的集聚，也为特定产业的集聚化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出口加工区，保税政策节约了企业成本，提高了出口生产效率。高新技术园区需要从研发到试生产等整个价值链合作，园区模式有效促进了产品价值链的形成。各类园区一般都采用管委会体制，具有准政府职能但又不同于政府的管理部门，这种体制使管理效率大大提高，因为企业面对一个管委会，不需要一一寻找各个政府部门。对于外资企业来说，园区模式也因此而更为便捷，大大减少了经营的制度成本。各类园区成为中国探索改革开放的重要平台，因为在这里可以发现需要什么政策，怎样设计和使政策落地，政策灵活性更大，政策效果得到直接反馈，有效避免了新政策在全局范围推出可能产生的错误。

（四）发挥各级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效实现了超大型经济体的全面进步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发展任务繁重，单靠中央政府的积极性和规划要实现高速发展是不可能的。改革使中国形成了一个各级地方政府均有强大经济职能的特殊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可以被称为“区域发展导向型市场经济”，以“区域”特征不同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导向型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发展动力和经济职能，在中央的统一战略下积极制订区域发展规划，设计激励政策，推动政策落地。这是中国“有为政府”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优势之一。

对外开放的发展同样得益于这一具有优势的体制。各级地方政府积极优化投资环境，设计产业目标，规划园区建设，改善软硬环境。许多政府官员深入招商引资项目第一线，沟通各相关部门，解决问题，完善政策，突破现行体制障碍。同时，由于地方政府同样关心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发展，为外资企业和出口产

业的发展创造了全面的供应链配套,促进了内外资企业的集聚式发展。项目落地带来了更高的税收从而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资金,使地方政府有更多资源招商引资,形成良性循环,这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大制度成因。

中央的统一领导和战略目标的逐级下达,也确保了发展战略不断推进。中国的发展不仅是高速的,而且是在水平与目标上不断提升的,体制优势确保了发展的不断进步。从脱贫到致富到求强,从实现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到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水平,从实现规模化增长到创新式发展,从付出巨大环境成本到以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中国发展目标的不断进步正是来自体制的优越性。

(五) 准确把握经济全球化特征使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大发展模式有了全新内涵

国际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时着重比较了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两种模式。中国的发展既没有参照出口导向战略,也没有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而是从经济全球化的最新实际出发,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对外经济关系发展战略。

出口导向战略的本来意义是从一国的比较优势出发大力发展出口产业,以此实现资金与外汇积累,突破发展瓶颈。进口替代战略的意义是为实现工业化对幼稚工业部门加以保护来替代进口。然而中国的出口除了一般劳动密集型和资源性产品外,更主要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特别是加工贸易出口。以外资引进实现出口发展是中国开放的一大特征,中国因此有效利用了大量低端劳动力,完全不同于历史上一些国家基于本国产业的出口导向或基于本国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因此,中国开放以来贸易发展的特征是外资主导型出口增长,用传统出口导向概念来总结中国开放型发展道路是不确切的。

在进口替代意义上,一方面国内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建立起了一批新兴产业,同时国有企业坚持改革创新使装备制造业等也得到了长足发展。另一方面,四十年来中国许多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由外商投资形成的。由于国内市场对外资开放,一大批新兴产业迅速从发达国家延伸或转移到中国。从最初零部件完全进口到越来越多的零部件由国内生产,四十年来中国通过不断延长国内供应链的方式使这些外来产业逐步转变为中国产业,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进口替代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既有民营与国有企业在开放竞争、有限保护下的传统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又有从外资产业转移开始国内价值链不断延伸的新型发展模式,后者是全球化新条件下的模式,不同于传统的进口替代模式。

(六) 自由贸易试验区为突破改革与开放中的难题建立了新平台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时代,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经验表明,需要推进的改革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包含着一定的风险,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进行探索是一条比较稳健的路径。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出现了新的态势。跨太平洋战略伙伴(TPP)谈判和各种双边及区域投资协议都表明,全球化要求的一国开放已经从边境措施进入到边境后措施,即不仅要求各国降低关税和取消非关税壁垒,扩大市场准入,而且要求各国的国内经济体制更加规范、透明、公正、法治。扩大开放的要求已经超出了中国所熟悉并适应了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要继续参与全球化进程,就需要熟悉新要求,而这些要求基本上又是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相一致的。因此,以开放倒逼改革成为在全球化新态势与改革新目标下的科学选择。

从上海开始的自贸区试验实现了改革开放探索中的一系列重大任务。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为商务成本的节约创造了条件。投资市场准入显著扩大,以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为内容的开放模式取得了新经验,进而国家外商投资指导目录转变为负面清单,实现了市场准入模式的国际接轨,引进外资更加规范透明。事前审批改为事中事后监管,外资进入更为便捷,政府监管更加全面。服务贸易扩大开放得到了有效探索,更多服务业新领域开始引进外资。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得以推进。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深化,向着服务市场、规范透明高效方向持续进步。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得到了进一步的探索,在促进开放、防范风险上取得了新经验。

继上海之后自贸区试验前后三批扩大到 11 个省市,2018 年 5 月又宣布了海南全省建立自贸试验区,前后四批经验在全国推广。自贸区这一在国际上早有实践并广泛采用的形式在中国新时代赋予了全新的内涵。

上海的率先试验形成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新机制，即通过一地探索取得经验进而在全国复制推广。第二批天津、福建、广东的试验把平台拓展到北、东、南三大沿海地区，以开放为共性各有定位。第三批内陆地区七省市的试验又赋予了这一平台结合各经济区战略定位进行创新发展全面探索的使命。海南全省建自贸更启动了开放型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实践表明，以试验进行防风险探索和压力测试，以复制推广实现改革成果制度化，以“清单”实现各种意义上的透明与规范，已成为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标志。

（七）“一带一路”建设使内陆成为开放前沿，创造了发展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新机制

“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中国对外开放构建了一个新的格局，也创造了全新的经验。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一国的开放型发展往往与港口城市和沿海地区分不开。四十年前中国的对外开放也是从沿海开始的，更因为大国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开放的前沿地区和内陆地区在开放度上会出现巨大差异，这一差异又会导致整个发展水平的差异和不平衡。

“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经验首先在于，对外设施联通可以把内陆地区从开放的后卫转变为开放的前沿。“一带一路”建设以来，内陆诸多城市建立起了与欧亚国家的陆路联系，为贸易投资关系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开放战略的这一推进解决了多年来探索未果的一系列问题，即沿海地区的外向型产业如何向内陆转移，沿海地区不断提升的商务成本如何控制，东南亚国家是否比中国沿海地区有更强的竞争力，等等。

与沿海地区当年的开放不同，由“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的开放格局的调整并不是通过特殊政策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突破的。这是国家利用基础设施建设巨大产能条件的成功举措。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既改变了内陆地区的发展条件，又扩大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合作对象，是一个一举多得战略举措。内陆地区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长期以来是发展的瓶颈，而今天中国的建设能力已经可以对此实现突破。这一建设又与“一带一路”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相联系，甚至与欧洲市场相联系，这就使得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改善了自身发展的条件，而且改善了国际合作的条件。在开放促发展的成功经验上又形成了以发展促开放的新战略，而这种开放又会在新的意义上促进内陆地区的新发展，发展与开放两者之间形成了互动。

（八）在开放中坚持自主的宏观调控有效防范了外部风险

传统国际经贸理论与发展经济学注重的是国际分工以及这种分工对国内产业形成的发展压力，最多讨论的是类似比较优势低端锁定的问题。对中国这样一个全面对外开放，日益深度依赖于外部市场的国家来说，更大的问题还在于如何防范来自外部冲击的宏观经济风险，四十年来的发展成就正是在正确的开放战略部署下有效防范这些风险中实现的。

宏观经济风险最主要的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以在短期内迅速改变一国的资产价格和汇率水平，并导致财富的迅速流失。在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中国充分发挥了国家的制度优势，正确运用了政策工具，成功地阻止了危机向国内的蔓延。在防范外部风险冲击中，宏观意义上实施包括坚定的汇率政策和有力的扩大内需政策等，微观意义上注重对衍生金融产品发展的谨慎和对虚拟经济泡沫的防范。宏观调控、开放进程和市场监管等共同构成了开放中的风险防范体系。

2008年金融危机是半个多世纪来世界的最大震荡，然而，中国不仅成功抗击了危机的冲击，而且为世界经济保持稳定与增长起了关键作用，极大提升了国家的国际地位。在外部市场急剧收缩的情况下，扩大内需是主要的战略举措，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政策协调和金融监管合作等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不但在危机期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而且被国际社会公认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力量。在扩大开放中防范外部冲击又取得了新的经验。

除了危机的冲击外，对外开放以来中国也一直受到国际社会主要是来自美国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出口政策、政府职能甚至所谓人权等种种非经济因素都成为美国对中国开放制造障碍的理由。在各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保持了战略上的清醒与坚定，通过从容应对赢得了一次又一次挑战。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在开放和世界经济的各种冲击下，必须保持政策上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注重防火墙建设，把握金融开放、货币可兑换和国际化进程，依照开放型市场经济规律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发挥

中国的制度优势积极应对，而不是简单地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根据其不合理要价进行开放，这是四十年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上的根本经验。

二、高速增长的原因、转型升级的必然与全球化经济机制

实现开放型发展不仅取决于选择开放，而且取决于对全球化经济规律的把握。四十年高速增长的成因就在于依据全球化经济的内在规律推进开放模式，注重开放升级，从而在多重意义上为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全球化经济理论提供了全新的案例与证明。中国正在推进的新开放战略，包括资本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和在开放中实现自主创新，同样反映了全球化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

（一）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对外开放的核心是促进要素流动实现要素合作

经济全球化始于自由贸易，进而推进到金融国际化与生产一体化。当国际直接投资成为世界经济中的普遍现象，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中的微观主体后，经济全球化便完全成型并全面展现出其基本规律。

对外开放之初，从要素禀赋理论出发，学术界曾认为中国应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并出口，这是参与国际分工的最合理方式。然而实践却证明这一道路并不畅通。低端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无法打开国外市场，并不能形成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和参与国际分工。只是在国际服装制鞋各种著名品牌到中国投资后，中国劳动力优势才得以发挥，中国制造才打开了国际市场。

中国大量吸收外资的实践证明，国际直接投资并不是货币资本的国际转移，而是跨国公司把其品牌、技术、创新产品、专利、科学管理、营销网络和货币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带到中国，中国劳动力优势才得以有效利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才得以生产并进入国际市场。这是中国四十年来开放型经济发展中最有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的现象与机制，其中反映的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战略是通过高级要素的流入与本国劳动力、土地等低级要素相结合才能实现生产和出口。“要素合作”是实现开放型发展的核心机制，而高级易流动要素向低级不易流动要素所在地流动从而导致生产地和销售市场的全球布局是其中的基本规律。开放之初，中国也曾采用国际借贷的方式利用外资，但这不是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及因此实现的出口和经济高速增长才是中国开放型发展的主要特征。

利用要素流动实现要素合作的条件是实行开放政策。开放既在于接受外商投资，甚至以特殊政策补偿其制度成本，也在于广泛的政府服务。土地批租制度的形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合法化，保证了中国低级要素与外资高级要素的结合。改革开放不但吸引了要素流入，而且使国内农村巨大的闲置生产要素被动员起来，与流入要素相结合，形成“要素集聚”。这是中国四十年开放型增长的微观机制和主要原因。

要素合作改变了经典比较优势论的条件和表现。经典比较优势论是从各国各产业相对生产力结构出发的，其证明了分工创造生产力是贸易的动因。比较优势的存在和现实中没有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因而一国的贸易结构就是其比较优势的表现。然而在当代要素流动的条件下，一国的贸易在日益高的比重上与国际贸易相联系，出口已不是本国生产要素的产品，而是外国要素与本国要素相结合的产品。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产业结构并不是中国比较优势的反映，而是包括流入高级要素在内的综合优势的反映。

要素流动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经典要素禀赋论的条件与表现。要素禀赋论所证明的一国贸易要素密集性特征完全是基于要素不存在国际流动的前提下得出的。当中国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时，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中国在其中所提供的只是低端劳动力，贸易的要素密集性不是中国要素结构的体现。

经济全球化要素流动及其影响规律是中国开放型发展模式所遵循和揭示的。中国高速发展的出口不是比较优势的反映，也不是要素禀赋的表现，而是要素流动、要素合作等全球化规律的表现，是中国要素集聚增长规律的表现。因此，如果用“发挥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来总结中国开放型发展的经验，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经典学说的要义，而且在实践上背离了中国的成功模式。经济全球化之前的理论尽管是经典的，但用以说明当代中国模式却是不适用的。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的时代性创新。

（二）投资超越贸易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规律并深刻影响了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出口的高速发展不是从自身比较优势出发或要素禀赋出发的，而是从外商直接

投资出发的，这充分证明了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一条基本规律即投资超越贸易。

投资超越贸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投资替代贸易。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生产并在当地销售，就替代了此前在母国的生产出口。中国开放外资企业内销就是这种替代的表现。由于这一替代，按传统统计方式中国的进口就会减少。二是投资创造贸易。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在于利用东道国的要素优势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没有跨国公司的这种投资东道国就没有这部分出口。在面向国际市场情况下跨国公司投资不是对东道国已有生产的挤出，而是新增出口。在中国，长期作为主要出口方式的加工贸易正是投资创造贸易的典型。在这里，创造的不仅是出口的绝对量，而且是顺差，因为加工贸易必然是出口值大于进口值。三是投资改变贸易。从贸易理论史可以看到，国际贸易发展从最初的产业间分工到产品间分工，又到产品内分工；贸易的性质从国家间贸易发展到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事实上产品内分工与公司内贸易正是投资改变贸易的表现。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生产地和贸易网络，一个产品被按照价值链分拆进行国际分工，贸易性质的这一历史性变化（名为国际实为公司内）正是国际投资所导致的。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同样是投资改变贸易的表现。

投资超越贸易的三种形态在中国开放四十年来得到了全面体现，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机制正是这一规律的全面体现，中国是这一规律的顺应者，因而也是受益者。

投资超越贸易也是当代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成因，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全球不平衡和中美贸易不平衡是全球化的一种规律性现象。

由于国际直接投资的规律是高级易流动要素向低级不易流动要素所在地流动，因而，发达国家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是全球化的总体倾向。前者把后者作为低成本生产地，同时又要继续消费后者的产品，于是与资本流动相反的是商品流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基本上就是这种模式，而中国是其中的代表。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被认为起于全球不平衡，事实上是新兴经济体外汇储备回流到美国并在金融监管不力下泡沫破裂的结果。

投资替代贸易又从另一方面加强了这种不平衡，美国的汽车、苹果手机及平板电脑在中国生产并销售，因此也就替代了中国从美国的进口，掩盖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使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更大。因此，在计算中美两国的贸易差额时，应当把在对方国家的生产销售视同出口计算在内。

价值链分工加剧了贸易的不平衡，中国的加工贸易是一个典型的成因。在加工贸易中出口必然大于进口，因而必然导致出口国的贸易顺差。长期以来，中国的全部贸易顺差都来自加工贸易，而一般贸易还是逆差。阐明这一点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在投资创造和改变贸易的情况下，基于海关统计的贸易平衡已经没有意义，不能反映一国从贸易中的真实收益。即使近年来推进的增加值贸易统计研究也没有把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创造的价值分离出来，从而仍然夸大了出口国的贸易收益。所以美国基于海关统计贸易不平衡指责中国是不合理的，一些研究即使采用增加值来调整顺差规模也仍然是不充分的。

由于贸易不平衡产生于上述原因，用汇率进行调整或用政策进行调节都是不合理的。只有当新兴经济体扩大对外投资，并因国内消费扩大而增加进口，不平衡才可能逐步缩小。这一分析也证明了，美国对中国对美投资设置障碍违背了全球化不平衡调整的要求。

对外开放始于引进外资必然走向同时对外投资，建立全球生产经营网络是中国在全球化中争取主动的必然要求。

（三）要素收益差异是全球化收益分配的核心，本国要素升级是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和建设经济强国的关键

对全球化要素流动机制的认识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对外开放中收益的规律，那就是一国的要素结构及其等级水平决定了一国的开放收益，提高开放收益的根本在于提升要素结构。

在对外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后，21世纪初中国学界开始关注中国在开放中所获得的收益问题。各种讨论集中在价值链分工地位。事实上低端分工地位的成因正是由中国的要素结构所决定的。

全球化不是按比较优势分工而是按要素差异合作，这一规律决定了以投资贸易全过程形成的国际经贸关系中的收益分配最终是各国之间的要素收益分配。因为最终产品是多国要素的集合，每一要素都要求获

得与其价值相应的回报，因而产品的全部收益必然要在所有参与的要素间进行分配，而又因要素所有者非一国使分配成为国际分配。

正如商品的价格是由其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所决定的一样，生产要素的价格也是由其生产成本和相对稀缺性所决定的。从当今全球化的实际看，技术、品牌、销售网络和经营管理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是稀缺要素，而低端劳动力等低级生产要素是充裕要素。前者决定了跨国公司全球投资选择的主导权，后者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中的竞争性，同时也更降低了土地、资源、环境等的价格。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在世界上是稀缺的，发展中国家为引资而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和土地等是过度供给的，为竞争外资更导致了其价格下降。

生产要素是可以跨国流动的，但要素的所有者却仍然是有国籍的。因此，要素稀缺性决定收益的规律最终决定了全球化经济中的国际收益分配。

要素流动导致了全球化经济与以往基于国际贸易联系的世界经济的差异，然而流行的统计指标却掩盖了这种差异，使人们不能深刻认识全球化中的国际收益分配。例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以地理意义上的国家或经济体进行统计的，包含了流入要素所创造的增加值，这就夸大了要素净流入国家的经济规模和增长率，更夸大了基于本国居民数计算的人均 GDP 所反映的富裕水平。又如，一国的出口是国际要素合作的产物，对于大量由跨国公司创造出口的东道国来说，出口能力也是被夸大的。贸易顺差更多反映的是跨国公司的收益而不是本国企业的收益。

在四十年中的前大部分时期内，中国的外资是净流入的，上述要素流向规律在开放型发展的中国具有典型意义。从 21 世纪初开始的自主创新和对外投资，正是基于对这一规律的认识上的战略升级。

自主创新的核心是技术，但却不限于技术，产品、品牌、商业模式、服务等都可能创新。一切创新最终会归结为生产要素，因为其投入都需要通过不同的成本核算分摊进入最终产品价格。因此，中国的自主创新战略本质上就是创造和培育高级要素的战略，是实现要素升级从而在全球要素合作中争取更高收益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正确性就在于它是基于对全球化要素合作，收益按要素稀缺性决定的规律的认识。大力发展教育，注重人才培养的战略正是基于对高端人才是高级要素的认识，这是中国改变靠低端劳动力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关键。

中国的对外投资战略也反映了以实现要素升级提升分工地位规律的要求。在经历了最初以自然资源开采为主的国际投资后，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聚焦并购方式。并购是迅速获得国际成熟企业从而获得其所拥有的技术、品牌、市场网络等高级生产要素的有效途径。在四十年前的前半段中，中国在正确的开放战略下靠辛苦劳动等低端要素实现了积累资金外汇，为今天的国际并购创造了有利条件。整个过程显现了一条十分有价值的发展规律。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的前期和后期选择是不同的。前期只能靠低端要素获得较低收益，但这又是必经阶段。这一阶段的成功可能突破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双缺口”瓶颈。而中国不仅在这一点上取得了成功，而且为后一阶段创造了条件。以国际并购加速要素升级不等同于靠购买实现现代化。并购是一条充分利用全球化和发展新优势的道路。中国在美国并购中所遇到的障碍表明，美国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中国改变自身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抵制中国的并购正是美国维护其高级要素优势以及国际分工高端地位的需要。

可见，中国开放战略的升级是基于对要素收益决定规律的认识，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的正确选择。

（四）自主创新是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升级的根本

开放是为了发展，即产业结构的进步，从而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这一点在对外开放之初就是有共识的。正因为这样，开放之初对外资进入是谨慎的，特别是不开放国内市场，以使国内企业不在竞争下失败。也因此在外资利用上曾采用了借外债而不是开放直接投资的方式，因为前者归还债务后产业是中国自己的。外贸上难以迅速降低的关税也是因为保护的需要。但是在这一理念下开放型发展受到了较多的限制，外资流入少，外贸增长慢，开放度难以提高。

加工贸易迅速突破了出口发展的难题，开放国内市场也大大激励了外资的流入，这是对外开放中的重

要进步。但是不久后人们就开始发现中国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地位，包括价值链意义上的和产业间分工意义上的。人们的探索聚焦到如何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如通过延长国内供应链，通过中外合资，通过技术转让或获得各种方式的技术外溢。然而，所有这些途径在实践上都存在着难点，成效较低。中国认识到技术是发达国家处于高端分工地位的根本，但不论什么政策措施，要通过引资和市场开放获得中国的技术进步是困难的。

决定这一规律的原因在于，尽管贸易与投资可能相应地伴随着技术的流动，但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整体规则却更偏向于严格保护而不是促进转让。技术优势是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国内保护制度的延伸，不利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投资过程获得技术。专利等的国际市场交易虽然存在，但是大量限制性商业惯例特别是对二次创新所有权的约束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靠购买获得技术进步。发展中国家推动国际技术转让的各种努力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当今国际制度的基本偏向，即更强调保护而不是更鼓励合理合法的产权流动。面对国际制度的这一状况，发展中国家纷纷在外资政策上进行努力，如鼓励技术转让、设定股比限制、要求进行合资，等等。从经济学意义上说，这可能是用一种政策引致性扭曲去消除跨国公司的垄断性扭曲，具有提高福利的效益。但是，发达国家却以政策不公平、市场不开放等为由提出质疑，甚至进行各种报复。

上述分析证明了一条规律：在现行全球化的制度安排下，外贸与外资的发展基本上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途径；发展中国家实现技术进步根本有效的途径只能是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就是本国企业进行研发投资实现技术、产品、服务、管理和业态等方面的创新。中国的实践表明，由于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成熟，自主创新有了显著进步的环境和基础。近年来，民营企业中出现的大量技术、服务和业态创新都是基于自主研发的成果。

自主创新的关键条件是资金积累和人才供给。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创新高潮，正是四十年来高增长下实现的资金积累。社会资金总供给的充裕为此创造了良好条件，政府的鼓励政策也离不开这一宏观条件。由此证明了一条规律：自主创新是在社会资金积累条件下实现的。

对外开放对社会资金积累做出了重要贡献。外贸外资的双顺差是中国在开放中完成资金积累的基本原因。在突破了出口和引资的瓶颈后中国长期保持了巨额贸易顺差，加上资本净流入，两者共同构成了开放中的积累，其表现为外汇储备的持续上升，而对应的货币发行则转化为社会的资金供给。这一供给与高增长下储蓄创造的资金供给一起为创新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

今天，中国正在呈现出一个强大的自主创新潮流，其背后就是开放型发展下的资金积累规律。传统理论回答了一国为实现工业化的资金积累问题，中国的实践则回答了当代新产业革命或曰信息革命的资金积累问题。

三、开放型发展的新课题与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新挑战

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有了新的目标，对外开放有了新的重点，“一带一路”建设是对外开放的重点，高质量发展目标向对外开放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近年来以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为标志，经济全球化出现变局，中国开放型发展的国际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全球化变局向中国开放型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全球化经济理论为中国的开放型发展模式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一）“一带一路”建设将形成各国共同发展新机制与中国开放型发展的新内涵。

无论是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还是从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上讲，“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和长远影响，是新时代扩大开放的主要内容和与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将使对外开放与国内区域发展得到紧密的结合。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对外联通不仅将使内陆地区从开放的后卫变成前沿，而且会形成国内外产业的集群式发展，推进内陆地区的城市化和国家各战略经济区的发展，带来新一轮增长。国内大市场的进一步扩大将部分补偿沿海地区增长率的下降和加工贸易的减少。中西部地区与沿海地区的对外开放将形成一个新的格局：沿海地区继续面向美、日、韩等海

洋国家和东亚地区，中西部将重点面向东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陆路运输在高价值产品上的优势将更加明显。

在国内开放新格局下，各区域之间的发展竞争也将出现新的内容。人才政策要避免过度竞争和无效竞争，项目竞争要避免各种优惠政策导致不合理配置，贸易物流竞争要避免价格补贴。总之，当开放进入全国布局、目标面对高质量发展后，中央政府应当推出对各地开放型发展绩效的新的合理评价体系，这与国内经济创新科学评价体系的需求是一致的。

“一带一路”建设绝不只是重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合作对象绝不只限于历史上丝绸之路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建设是在中华悠久文明基础上中国引领和倡导的全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合作，而且并不排斥发达国家的参与。因此，“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在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这就不仅把有史以来发展的内涵从一个国家如何实现自身发展，包括如何利用好外部条件的问题，战略性地拓展为不同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共同发展的问题。这就改变了发展中国家只能与发达国家进行垂直分工的传统思维和发展模式，开启了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中国作为最大最成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于发达国家那样拥有大量高技术产品需要寻找垂直分工的生产地，也不同于 20 世纪末发达国家那样需要把传统产业向外转移而在国内实现升级。中国的优势在于传统工业化的快速实现，具有巨大的制造能力，特别是在现代大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具有强大的生产力，这正好符合发展中国家启动工业化的需要。因此，这是中国特殊优势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模式。“五通”全面表明了这种合作的创新模式与深刻内涵。政策沟通是前提，这使合作可以尽快启动，而避免了自由贸易谈判的冗长与难点。设施联通是起点，这是中国发展经验的推广，基础设施是工业化的条件，这使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可以得到关键的突破。资金融通是关键，全球资金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创新将极大地缓解现有发展援助资金的不足，有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双缺口问题。贸易畅通是效率，以分工的深化创造新的生产力。贸易是各国经济发展的结果和体现，中国绝不像当年帝国主义那样把殖民地当作原料产地和过剩商品销售地，而是以帮助其走上现代化道路，进而在贸易中合作。民心相通是比经济合作更高的目标，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不只为经济合作，而且还致力于更高的国际友谊与文化交流。

因此，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一定要以与各国形成共识为出发点，为此要通过从官方到民间的广泛交流促进共识的形成。“一带一路”建设不限于单个项目的经济效益，而是要全面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长期效益，为此要使企业明确这一点，也要在政策和资金上支持这种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绝不是中国过剩产能的向外转移，而是要发挥中国优势产能的作用以推动国际合作基础设施建设，也要通过合作加快相关国家的工业化。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而是世界的事，即世界的发展大业。为此要在联合国等各国国际组织中形成共识与机制，欢迎发达国家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大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影响世界的格局。对发达国家继续以冷战思维看待国际关系的人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为此中国学术界要做出努力，有效传播正确理念，逐步转变发达国家学术界和政治家们的误解，为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二）高质量发展改变发展理念与政策，对外开放将以产业政策决定外资外贸政策，中国发展将面临国际竞争新课题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对发展提出的总要求，也是对开放提出的新要求。高质量发展决定了开放理念与政策的转变，也将使中国发展因此面对新的国际环境。

与进入新时代以前经济发展的总体特征一样，对外开放也遵循着数量型增长、规模化发展的要求，出口高增长和外资引进持续增长是开放推进的主要标志。应当承认，外贸外资数量体现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也体现了发展的成果，对整个经济数量型增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进入 21 世纪后，在外贸上强调分工地位的提升，在外资上注重项目的质量，都体现了在数量型增长同时在质量上提高的需要。

高质量发展目标的提出也对开放提出了根本性的要求，外贸战略与外资政策必须依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来实施。外贸外资的发展必须符合保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家园的要求，坚决抵制高消耗高排放的生产，

改变国际资本把中国放在价值链分工低端位置的格局。

创新驱动发展确定的发展的理念，中国制造 2025 规划了产业升级的方向。高质量发展的产业政策目标已十分清晰，新时代外贸外资的发展应当以新的产业政策为指导。促进自主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同样也是外贸外资政策的要求。

当前，世界新产业革命正在全面快速爆发之时，国际竞争必然十分激烈。美国将全力维护其在科技上的优势地位从而对中国设置障碍，直至用贸易报复手段阻碍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2018 年 301 调查和挑起的贸易战清楚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赢得这场新产业革命竞争的胜利，是当前开放的主要任务。为了实现合作共赢，在外资市场准入上中国应当坚持在某些产业中的合资原则和股比要求，按照负面清单规范设定特别管理措施，使外资引进服务于中国产业政策目标。在部分产业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中，设立各种不符措施是国际通行标准，也是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谈判的内容。中国应以产业政策指导负面清单制订，特别是按照中国制造 2025 产业目录确定市场开放进程。坚持合资合作和设立股比限制是合理有效的做法，即使在签订双边投资协议下也是负面清单的合规内容。要坚决反击美国以贸易报复打开中国市场的做法。中国的一系列优势仍然对外资有着吸引力，其中包括巨大的市场规模、潜在的购买能力、完整的制造业配套系统、优秀的人才供给、地方政府的服务等等。在负面清单中要善于用好最惠国待遇例外和国民待遇例外，以实现与相关国家的利益交换。要通过负面清单保留政府对项目的审批权，以使外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相衔接。同时，要提高透明度和政策稳定性一致性，避免暗箱操作，避免内外资差别待遇，避免地方之间的政策差异。要让国内企业自主确定技术转让问题，使企业合同作为技术转让的方式，而不是由政府审批来决定。

要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完善法律制订和执法环境。同时，要充分保护中国企业进行二次创新的权利，打破发达国家对二次创新的过度限制，打破过度保护和技术垄断。要健全技术交易市场，使中国企业通过正常交易获得技术的渠道更为畅通。

外资领域的突破将是未来中国在开放中加快创新的关键。由于冷战思维等非经济因素，美国等发达国家将继续在所谓敏感技术上限制对中国出口、投资和技术转让，否决中国对其企业并购，这一问题很难在商务谈判和利益交换中解决，需要有重大的外交战略支持。

（三）中国的道路特色与体制优势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理念矛盾长期存在，在深度参与全球化的同时要坚持中国特色。

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中国是在参与全球化中受益并崛起的，要继续坚持开放和参与的道路。但是，扩大开放与深度参与全球化并不只是降低贸易障碍和扩大市场准入。全球化深化对各国提出的市场准入内涵日益扩大，核心是从边境上措施扩大到边境后措施，对一国的国内经济乃至政治社会体制提出要求。由于现行全球化的内涵从本质上讲是各国市场经济的外部联系，从而要求各国纯粹按照发达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去接受全球化，因而已经深度触及各国的国内体制。不论是美国已经退出的 TPP，还是仍然在不断推进中的双边投资协议，竞争中立、国有企业、工会制度等都被作为完全市场经济的规范被纳入全球化规则。虽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早已超过十五年，但是欧美依然坚持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从而使中国不能在这一组织中获得平等待遇。以美国提出的中国非市场经济地位备忘录为例，美国的理由包括：中国货币资本项目不完全自由兑换，政府干预外汇市场；工会不独立没有集体工资谈判权；市场准入有限制；大量国有企业、银行，土地市场受控制；政府有详尽的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法律成为经济政策的工具等。可以看到，除了货币最终可能实行完全自由兑换，市场准入会不断扩大开放外，其他四个方面都关系到中国的基本制度，甚至恰恰是中国的体制特征和优势所在。因此，中国的体制模式与欧美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已经显现，并且不可能调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实质上产生于制度摩擦。

中国入世后努力履行各项承诺，开放市场、修订法律法规、改革政府职能，但是从美国标准看来，中国没有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的改革已经不断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基本形成，但是中国所确立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体制与美国式市场经济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异。各国的制度

应当以适应各国的国情为原则，世界不可能只有一个模式。因此，当全球化立足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市场且各国应当遵守和维护共同规则时，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各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制度都必须按一个标准去统一。否则，全球化就会与各国的制度特色相冲突，也会与各国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制度需求相矛盾。

中美贸易摩擦表面上是贸易不平衡问题，实质上是美国力图在新产业革命中压制中国以继续维持其世界科技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是美国拒绝接受中国按自己国情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美国发起贸易战的种种理由涉及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政府经济职能、国有经济和政治法律制度。对中国来说，开放可以扩大，利益可以交换，改革应当继续，但是制度特色不能放弃。因此，在未来的开放型发展中，中国与美式全球化之间的制度摩擦将长期存在，两国之间只能在存异中求同，即避免制度对抗，寻求合作共赢。

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将不断提升，市场准入将不断扩大，以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的改革将不断深化。但是，中国的有为政府、国有经济、社会政治制度特色必须坚持。中国要坚持履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义务，维护其职能与规则的权威性，并继续推进各类双边多边一体化合作，也包括从深度参与全球化的要求推进改革，但绝不是全盘按照美式全球化标准改变自己的制度。与此同时，还要积极按照适合于中国也适合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特点和需要的模式推进国际合作。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新平台上的合作，包括使这种合作日益制度化，这将是与推动全球化的新的内涵。

（四）美国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开放形成新挑战，中国要加强国际合作抵制美国霸凌主义。

特朗普执政后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在美国优先政策下的退群行为已使经济全球化出现逆转态势。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以中国市场不开放为理由，以贸易巨额逆差为依据，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中国进行的贸易报复和投资限制，已构成新时代开放型发展的最大障碍。

美国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投资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却用贸易不平衡尤其是货物贸易不平衡的传统标准为理由搞报复，更采用单边主义手段反全球化，这是当前问题的实质。美国从对全球投资中获得了利益，其跨国公司全球发展的成就便是美国利益的表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东道国获得了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和出口顺差，事实上其中包含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投资收益和产品销售。贸易规模及其顺差并非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开放收益的准确表现。在服务贸易出口顺差上，在金融市场的全球地位上，美国更是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面对全球化的这种结构性现象，如何使其利益分配关系更加明确，各国不同社会群体因开放形成的更大收益差异更好得到控制，从而使全球化和各国的发展更可持续，这本是世界各国共商共建的问题，而美国的单边主义却彻底破坏了这种合作。特别是美国以霸凌主义行为处理全球化经济问题，对中国的开放型发展环境，尤其是对外开放的战略升级构成了新的挑战。面对这一挑战中国至少应考虑以下对策：

首先，要以理论创新赢得国际话语权。中国要从全球化的经济规律上阐明收益分配的实质，证明美国跨国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证明当代贸易收益的科学算法，证明贸易不平衡不是全球化收益分配的表现，证明中国的成就在于改革释放社会生产力而非靠不遵守国际规则，等等，以此在国际社会中赢得主动。为此特别需要理论界与对外商务谈判部门的深度合作，避免陷入反击对报复的双输困境，避免在美国无理压力下按照美国标准进行调整。

其次，以加强国际合作反对单边主义。美国的霸凌式保护主义不只针对中国，也同时对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搞保护主义，因而引起世界共愤，特别是有些行为已经导致国际社会的混乱与矛盾。中国要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共同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合作的基本原则是维护现行全球化规则和开放承诺，以双边谈判缓解短期摩擦，以多边合作建立更好的国际规则。面对发达国家可能出现的国际合作新格局，既要深化国内改革创造条件积极参与各种以市场开放为基础的国际协议，又要积极主动推进适合于中国经济体制与发展特点的多种国际经济合作模式。

再次，坚持以中国为主创新开放型发展模式与合作体系。投资与贸易是过去四十年的主要开放方式，而发达国家又是主要合作伙伴。为突破美国的障碍，中国要与更多国家签订双边贸易投资协定，尤其是与

欧盟、日本及新兴大国的合作。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创造更多的项目合作，以及以大项目带动全面合作，以政策沟通带动项目合作。要吸引发达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利用其资金和技术优势，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共商共建共享。要更好发挥外经外援的积极作用，突破以市场开放承诺先行的传统美式合作模式的制约，形成项目先行更加务实的中国式的全球经济合作模式。

（责任编辑：沈敏）

Fourty Years of Chinese Open-Development Road: Strategic Points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ZHANG Youwen

Abstract: The Chinese open-development road has been realized through a series of important strategic points, and has a deepgoing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by its innovation. There are ten strategic points for China to construct its open-development system and realiz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40 years of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e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has been promoted and realized through a series of strategic points, and the economic law of globalization has proved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China's open-development system, as well as the inevitability of promot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t present, China faces with new issues for its opening to the outside, including one-belt-one-road construction,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o the opening. The economic theory of globalization has provided Chinese open-development model with abund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gainst the trade protectionism of USA.

Key words: reform-and opening, open-development, elements flowt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上接第 80 页）

The Effect of the Language for On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y:Barrier or Promotion

SU Jian, GE Jianguo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 is the top-level design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achieve mutual benefit. Because of the communicativ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language, it has important influence on bilateral trade. The paper using panel data to study on the effect of the language for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y, we can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Language can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and promote bilateral trade, so the general English proficiency is important to the bilateral trade flows. (2) Language communication will give the country language bonus boosting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trategy. (3) As a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language differences may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bilateral trade flows. However, the impact of a country's language diversity index on international trade flows is uncertain. Therefore, the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re: cultivating trade specialized personnel who is well up in English; accelerating the breadth and intensity of language communication; playing the role of Confucius college and making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promote language; cultivating minority language talents.

Key words: One Belt and Road, language communication, English proficiency, trade flows